

「直木賞」獲獎前後 邱永漢的文學路

他是第一位以二二八事件為文學創作題材的作家，其戰後一連串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作品，不僅呈現個人色彩鮮明的政治立場，也揭露戰後從日本殖民政府到國民政府的「政權交替」時期，臺灣身處曾是敵對二強的夾縫中的艱困立場。

邱永漢於1955年以〈香港〉獲得「直木賞」，是第一位獲得這個象徵日本大眾文學最高榮譽獎項的臺灣籍作家。但在今日，邱永漢的形象可說是與「金錢」以及「股票」緊密連結。綜觀其在2012年5月辭世時的相關報導，除了「直木賞」獲獎作家的頭銜之外，幾乎都聚焦於其經濟評論家的身分，以及回顧、讚嘆其在投資方面的獨到眼光。這反映了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臺灣，邱的文業幾乎完全為人所遺忘。他停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轉向商業投資，同時以經濟評論家身分活躍於日本社會，當然是其作家身分被遺忘的最主要原因。

文學生涯與逃亡經歷

1924年，邱永漢出生於臺南，父親邱清海幼時自福建移居臺灣，在臺南西門市場經商，母親堤八重是出身九州久留米市的日本人。因為這樣的關係，邱永漢得以進入臺南當地勢力者子弟才能就讀的南門小學校（按：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人就讀公學校，日本人則就讀小學校），畢業後通過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考試，進入高等科文化系就讀，同窗友人王育德。臺北高等學校求學期間，邱永漢自1939年起，便以本名邱炳南陸續發表詩歌與文學創作。除了與同窗發行同人誌詩刊《月來香》（1939.2，1939.5），也投稿至學校刊物《翔風》，發表作品有〈霧·家鳴〉（1941.07）、〈雨愁〉（1941.12）、〈書物〉（1942.09）等，可視為他同人誌活動初期的習作。1941年加入臺灣文藝作家協會，陸續發表〈廢港〉（《華麗島》，1939.12）、〈鳳凰木〉（《文藝臺灣》，1940.03）、〈戎克〉（《文藝臺灣》，1940.07）、〈米街〉（《文藝臺灣》，1940.10）等。概觀其日治時期的作品，可窺見深受西川滿耽美頹廢的美學風格所影響。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邱永漢前往日本「內地」升學，通過日本國內最高學府的東京帝國大學入學考試，進入經濟學部就讀。王育德也在第二年通過東京帝大文學部考試，二人再次成為同窗。

圖

財訊雙週刊、國立臺灣文學館
吳佩珍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邱永漢於1955年以〈香港〉獲得「直木賞」。
（財訊雙週刊提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當時邱永漢仍於東京帝大就讀。同年9月畢業，進入研究所，聽說有船隻返回臺灣，便決定回國，於1946年2月抵達臺灣。返臺後的邱永漢在銀行任職，對於臺灣得到解放，返回「祖國」懷抱，充滿欣喜，與友人對於建設新臺灣都懷抱著憧憬。但目睹國民黨政權來臺後的統治現實，美夢旋即破滅，緊接著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許多臺灣人遭到殺害；在廖文毅的示意下，邱永漢向聯合國寄出「實施臺灣公民投票請願書」，內容為希望透過公民投票，決定臺灣是否該歸屬中華民國。此舉令他感到生命遭受威脅，於1948年亡命香港，投靠先一步抵達香港的廖文毅；其後便宛如追隨廖文毅般，在1954年移居日本。

抵達日本後，他以邱永漢為筆名展開作家生涯。在1954年到1958年間，以〈偷渡者手記〉為始，發表了〈濁水溪〉、〈香港〉、〈敗戰妻〉、〈客死〉、〈檢察官〉、〈故園〉；〈毛澤西〉、〈首〉、〈過長的戰爭〉、〈有風的那日〉、〈看不見的國境線〉、〈韓非子學校〉、〈刺竹〉（以上7篇收入單行本《刺竹》，1958.6）；〈東洋航路〉、〈惜別亭〉、〈南京街後巷〉、〈海的口紅〉、〈傘中女〉、〈時裝模特兒少女〉、〈死於香港〉（以上7篇收入單行本《惜別亭》，1958.11）以及〈華僑〉等近30篇作品，幾乎均屬力作。其中，最受人矚目者，應為1956年獲得第34回「直木賞」的〈香港〉了。

首獲直木賞提名——〈濁水溪〉

事實上，說到邱永漢獲獎的〈香港〉，便不能不提在那之前於1955年獲得第32回「直木賞」提名的〈濁水溪〉。〈濁水溪〉於1954年8月到10月在《大眾文藝》連載，是長谷川伸主持的大眾文學同人團體「新鷹會」的文藝雜誌。邱永漢移居日本前便已加入「新鷹會」，戰後於日本文壇發表的處女作〈偷渡者手記〉也發表於《大眾文藝》1954年1月號。

〈濁水溪〉共分三部，是邱永漢個人色彩濃厚的自傳性小說。故事梗概自敘事者「我」



邱永漢，《濁水溪》，1955年。河原功捐贈。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的少年期開始，在殖民統治的學校中因身為臺灣人而受到歧視，之後進入臺北高校，受到具自由主義思想教師的洗禮。1942年進入東京帝大經濟部就讀，在此受到具民族意識的前輩臺灣青年劉德明、周遭臺灣留學生以及主張與中國融合的德村教授的感化，「我」開始思考偷渡到中國大陸。但1943年日本開始對殖民地出身的學生進行志願兵的強制招募，「我」便開始了逃亡生活。直到日本敗戰為止，一直潛伏於德明所介紹的租賃處。之後「我」回到「光復」的臺灣，但故鄉卻到處充斥國民政府腐敗的統治，要職以及企業大多被隨國府來臺者佔領與接收，引發臺灣人的不滿，最後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臺灣陷入混亂狀態，國民黨軍隊登陸後，在全臺展開大屠殺。「我」不再涉足



《濁水溪》，朱佩蘭翻譯，允晨文化於1995年8月出版。

政治活動，開始從事日本、香港之間的走私貿易。在這當中得知德明行蹤不明，於是四處探訪尋找，但因為與德明陷入三角關係，「我」奪走其心儀的女性翡翠，因而失去了德明的友情，於是決意前往香港。

作品在此進入第三部，舞台從臺灣轉到香港。「我」從香港偷渡到日本，拜訪德村教授，在德村教授的勸告下，回到香港，從事走私貿易。這當中，結識了王兆立，人稱海童的貿易商。海童專門走私貨物進入臺灣，「我」開始與他一起行動。之後海童為「我」介紹了亡命香港的臺灣政治家莊慕良。莊接受美國援助，以解放臺灣為目標，海童則為了籌措獨立運動的資金而進行走私貿易，「我」因此對海童開始有了共鳴。但海童卻與山東幫的走私業者起了糾紛，最後死於車禍。「我」認為海童之死是捲入了與臺灣獨立運動有關的暗殺，但莊阻止「我」進行報復。之後「我」聽說德明在臺南繼續進行臺灣獨立運動，於是下定決心繼續從事獨立運動，便離開香港，再次來到日本。

缺少「第三部」的單行本

連載結束後，〈濁水溪〉隨即以單行本形式於1954年12月出版，同時隔年獲得「直木賞」提名。然而單行本發行時並未收入第三部，獲得「直木賞」提名的，也是這個缺了第三部的單行本。評審委員村上元三認為《濁水溪》「單行本並未收入作者想傳達的第三部或許讓他吃了虧。」言下之意暗指刪去第三部可能影響了審查的結果。但為何刪去第三部？邱永漢自述，發行單行本時，因為檀一雄的建議，而刪去了第三部。對於〈濁水溪〉被刪去的第三部表示意見的直木賞評審還有木木高太郎：「聽說，此作品有所謂的第三部，據說雖然是寫了，但恐怕會引起國際問題，所以沒收入這書中。對於這點我也稍有不滿，但希望大家能注意到這位作家，因此便投票給他了。」

和泉司指出，所謂第三部可能引發的「國際問題」，指的是臺灣獨立運動的描寫內容。日本在1952年剛從美軍管轄的「殖民地」狀態獲得解放，同時與臺灣國民政府締結日華和平條約，因此在日本，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這時期的臺灣獨立運動等於遭到抹殺。第三部作品主角莊慕良的原型廖文毅，1950年亡命日本，1956年於東京宣布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發表就任總統。廖亡命日本時，因為有美國的支持，即使國民政府對其進行干擾，還是順利地滯留日本。但隨著韓戰爆發，美國為防止中國攻占臺灣，對於封鎖臺灣海峽，以及將國民政府置於反共勢力傘下的支援態度，轉為明確。同時進入美國反共陣線的日本與國民政府因而結成軍事同盟關係，1954年設立自衛隊，隨著「五五年體制」的誕生，催生了保守體質的自民黨，主要政治家多為國民政府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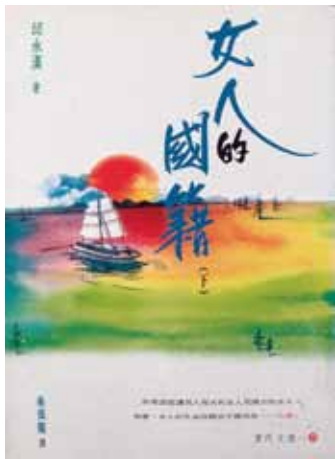
支持臺灣獨立運動者可說皆無。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濁水溪〉第三部對臺灣獨立運動與美國關係密切的描寫，被認為可能觸及當時美日雙方敏感的政治神經。刪去第三部，可說是出版社與作者的自我檢閱與規制。

對直木賞的強烈意識——〈香港〉

1955年8月，〈香港〉開始於《大眾文藝》連載，如果不知道〈濁水溪〉第三部的存在，自然而然地便會將〈香港〉當成〈濁水溪〉的續篇，因為〈濁水溪〉的「我」與〈香港〉中亡命香港的主人公賴春木，二者之間有不少共通點，舞台也同樣從臺灣轉換到香港，把二作當成前後篇，是非常自然的聯想。但，與〈濁水溪〉第三部相較，便會發現，〈香港〉顯然意識到美日關係以及東亞政治局勢的氛圍，而刻意去政治脈絡化。即使〈香港〉的主人公因1949年在臺灣參與政治運動而遭到追捕，作品中對於賴的政治立場、思想，及其所參與的政治運動內容，並無具體描寫。倒是將



《香港》，朱佩蘭翻譯，允晨文化於1996年2月出版。



《女人的國籍》，朱佩蘭翻譯，允晨文化於1995年8月出版。

走私貿易和香港的紙醉金迷以充滿娛樂性的筆調鋪陳，可見作者對「直木賞」的強烈意識不在話下，此作果真也在1956年一舉拿下第34回「直木賞」。

得獎之後的邱永漢，以外國人的觀點出版一連串「日本天國論」、「消費文化論」的日本文化評論，緊接著在1960年代完全轉向，專門出版股票評論以及理財專書。此外，邱在1950年代前後陸續出版的料理及飲食專書，銷路也極佳，讓邱永漢與作家頭銜逐漸脫節。1970年代中期，邱永漢重拾創作，出版《女人的國籍》、《台灣物語》等作品，但並未引起如1950年代時的矚目，其文學創作終至完全中斷。

臺灣文學史上一頁缺憾的空白

戰後文學界對邱永漢評價低落的原因，岡崎郁子歸納出以下三點：一、邱因二二八事件而逃往海外，即使是第一位以二二八事件為

創作題材的作家，但由於他與臺獨運動關係密切，作品無法進入臺灣，以至於戰前與戰中世代有日語解讀能力的臺灣讀者錯過了即時閱讀的時機。二、邱的作家生涯短暫，隨即轉往理財跑道，以至於臺、日二地都遺忘了他的作家身分與作品。三、在睽違24年後，邱永漢在1972年以理財之神的身分回到臺灣，當時吳濁流等作家請求他，希望能為臺灣文學做出實質貢獻，但邱永漢反應冷淡，因而引起臺灣知識分子的反感，也阻斷邱永漢作品引介至臺灣之路。

以上的政治因素以及其個人抉擇因素的影響，讓邱永漢的作品評價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定位，幾乎可說是空白。邱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作品，以及一連串以二二八事件前後亡命海外的臺灣知識分子為藍本的小說，是臺灣知識分子身處日本、國府政權交替時期，命運如何受到時代翻弄的重要見證。讓這些作品回歸臺灣文學史上應有的定位，將會更加厚實與豐饒臺灣文學的遺產，同時也能彌補臺灣文學史上這一段空白的缺憾！

【參考文獻】

- 岡崎郁子《台湾文学—異端の系譜》（田畑書店，1996年4月）
- 和泉司〈邱永漢「濁水」から「香港」へ—直木賞が開いたもの閉ざしたもの—〉《日本近代文学第90集》（2014年5月）
- 近藤純孝〈解説〉《香港・濁水溪》（中公文庫，1996〔1980〕年）